

开卷丛书

断魂枪

现代小说卷

王保生 编著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

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陕西



出版社

刻的便是它所体现的人的内在精神的普遍性底蕴；同时，由于任何人群、任何民族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生成、发展和演化的，并由此铸造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民族个性，故而文学又自然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民族风貌和文学精神。

从本体论角度看，文学是承载生命信息的语言建构。在长期的文学积淀中，形成了由各种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文本构成的文体系统。以文体类型而论，文学由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基本类型构成；以审美需求而论，有俗文学与雅文学之别；以创作流程而论，又有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分。所谓民间文学，是指大多由人民大众集体创作，反映民众生活愿望，并用口头演说的形式，在人民大众中间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所谓通俗文学，是指用通俗的书面语言形式表现大众所喜爱的生活内容的文学作品，大都流传于都市市民中间，也可称为市民文学。所谓雅文学，是指由具有丰富文化修养的作家创作，用比较高雅的艺术语言形式，表现某种比较深沉的人生体验和复杂的社会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层次与功能不同的各种文学共生互补，相辅相成；构成了文学的百花园。每一种具体文学样式，每一部文学作品，也都有自己的灵魂与血肉。正是这些众多的“生命”，建构起文学的生命系统。

从发展论角度看，在历时方向上，文学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共时形态上，它又包含了全世界不同民族地区，不同发展程度的文学。同时，它还是一种正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活的文学，人类正在不断地把自己从现实发展中展示出来的新质注入其里。因此，我们看待文学，必须站在本民族以至全人类共同创造所积成的巨大精神财富上，既不能割断古今，也不可划地为牢，应对文学的传统予以充分的尊重，对文学的创新持宽容的器度。

《开卷》作为普及性的大型文学丛书，旨在重点介绍和阐释中华民族文学、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有助于读者阅读，有必要对中国文学的常识，作一些说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已有 5000 年的文明史。中国文学同中华民族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中，汉民族文学始终居于主导的和中心的地位。早在文字发明以前，汉民族的文学就以神话和传说的形式，在人民口头诞生并流传了。像“女娲神话”、“羿神话”、“大禹传说”等等。这些独具特色、有永久魅力的上古神话传说，足以同世界上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

中国文学的发展，一般按照历史分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

古代文学，上起先秦时期的西周，下至 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前后 3000 余年。

诗歌是产生最早、发展最充分、成就也最为辉煌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有“诗歌大国”之称，古代诗歌以《诗经》和《楚辞》为源头。前者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后者以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为代表，气势磅礴，想象奇特。古代诗歌发展到唐宋时期，进入黄金时代，诗人辈出，诗篇累累，形成了以律诗为标志的近体诗。宋元之间，词诗有着密切联系的两种文体“词”和“散曲”，得到长足的发展，甚至分别成为宋、元时代文学的重要标志，故有“宋词”、“元曲”之说。词和曲是诗与音乐结合的产物。它们比律诗更为自由、灵活，利于传情达意。

古代文学中产生较早的还有散文。散文的源头可推先秦时期的《周易》、《尚书》、《春秋》、《左传》以及《庄子》等诸子散文。古代散文的发展有三个重要阶段。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百家争鸣中的诸子散文；二是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涌现了“唐宋八大家”；三是明清时期，诸如“竟陵”、“桐城”等流派的散文，

均异彩纷呈。

古代小说出现和发展较晚，这同它长期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邪宗”有关。小说虽萌芽于汉魏六朝、唐（传奇）宋（话本）时期均有长足进步，但比较繁荣发展的局面直到明清两代才出现。这是那时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明代主要是“拟话本”和通俗体长篇章回小说，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以描写日常家庭生活为中心的小说《金瓶梅》，以及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已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转向描写现实社会的寻常生活，从而进入一个新的艺术领域。清代的《红楼梦》便在这一艺术方向上，达到了古典小说的高峰。此外像《儒林外史》等等也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这一时期的《聊斋志异》，虽同“志怪”、“传奇”一脉，但在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中，包含着对自由幸福和光明的追求，成为文言小说的翘楚。

古代戏曲的开端是元人杂剧。杂剧包括“唱”、“念”、“做”等多种戏剧样式，可谓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综合体。它最初以北京（大都）为中心，流行于北方，很快传遍全国。元、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剧作家和作品。如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华古国从政治到经济、文化，开始了急剧、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第一个阶段，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史称近代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也称为近代文学。

这一时期，政治上、军事上失败的现实，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使得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国体的腐朽、文化的落后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在文学上有着明显的反映，最突出的是资产阶

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在这种主张影响下，出现了《官场现形记》(李宝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老残游记》(刘鹗)和《孽海花》(曾朴)等一批以揭露当时社会黑暗为主的“谴责小说”。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进步的爱国的作家、诗人。自此以后，就其主流来看，文学与国家政治、民族命运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社会和文学进入“现代”时期的标志，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自“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国的国情十分复杂多变，这给文学以直接的影响。“五四”前后，以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旗帜。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随着自身的日益觉醒，要求文学更自觉地表现自己的斗争生活，并且在形式和语言上进一步要求通俗化、大众化。30年代后期开始了抗战文学时期，其中包括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以东北三省为中心的沦陷区文学，上海的“孤岛”文学，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抗争文学。现代文学时期尽管只有短短30年，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不仅使它彻底完成了文学采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内容上的深刻转变，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积极的革新和发展，开拓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从而使中国文学开始同世界文坛声息相通。这一时期，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艾青、曹禺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家。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代文学40余年，在大陆，可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颂歌文学”为主潮。到文化大革命，整

个文艺园地一片凋零。粉碎“四人帮”之后，“文革”的惨痛事实，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过头来对自己的民族和历史进行深入的反省，这就促成了“反思文学”的出现。到80年代，反思由社会角度进入人的层次，继而又深入到民族的文化心理层次，遂有“寻根文学”之问世。这一时期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青年作家现代主义和新写实主义倾向的探索。从历史眼光看，“文革”以后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突破性的开拓和创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发展态势，是新中国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包括同一时期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文学。台港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在与大陆相异的特殊的人文环境中生长发展，有其明显的殊相，但同根同宗同文，其人文精神和语言风貌，却与中国文学传统命脉相通。台港地区有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理应纳入“开卷”者们的视野。

中国文学又具有多民族性。除汉族外，尚有55个兄弟民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民族，如藏、蒙、维吾尔、哈萨克、纳西、彝、满、柯尔克孜等族，都有自己的文学，这些少数民族文学遗产，有不少优秀的民族作家。有些民族还出现了能以汉文写作的著名作家，如杂剧作家李直夫（满族），散曲作家贯云石（维吾尔族），杂剧作家杨讷（蒙古族），词人纳兰性德（满族），作家尹湛纳希（蒙古族）等。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其中影响较大的，除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外，还有维吾尔族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彝族的《阿诗玛》，蒙古族的《嘎达梅林》，以及苗族、侗族的诗歌等。这些少数民族文学有如璀璨的明珠，与汉民族文学互相辉映，把中国文学的花苑装点得绚丽多姿。

中国文学历经了如此漫长的旅途。这片故园神州，是它丰腴的精神沃土，一代接一代地生长出文学之树、艺术之果。这世代相续、不断繁荣的文学艺术，恰似绵延的高峻山岳的巨灵，震撼着也温暖着人心与人生。我们为之自豪的还在于，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精神历来互相交流和影响，从而为文学的民族融合、艺术发展不断开辟着道路。中国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始终是鲜明的、无可替代的。这也使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人文精神有其极为丰富的包容性，体现出举世公认的博大深远的气象。

基于上述的认知，《开卷》丛书力图以科学的态度、历史的眼光、深入浅出的叙述，系统而又简要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华民族文学的基本脉络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之精萃，以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达此目的，丛书诸卷取以“文”为主、“文”“史”结合的编著体例，既侧重精选作品和文本导读，同时对所涉及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品类的概貌、特征、价值等进行史的分析。全套丛书共24卷，其中包括外国散文、小说、戏剧各一卷，旨在为我们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编著者均为在各自学术领域里耕耘多年的老、中、青专家学者。尽管如此，这套丛书仍然难以呈示伟大祖国无比丰富与恢宏的文学景观。但愿它作为广大读者的人生伴侣，携您共同步入辉煌的文学殿堂。

1993年夏 北京

前　　言

王保生

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民主和科学，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正在磨砺他们批判的武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还处在襁褓之中。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大声疾呼新作家的诞生，历史在期待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这个时候，鲁迅小说诞生了。1918年5月《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它通过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和心理状态的描写，暴露了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以“吃人”二字概括了封建制度的本质。它以忧愤深广的思想和犀利的笔力，以它特别的格式，激动了广大的读者；随后，《孔乙己》、《药》等短篇小说相继问世，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因而《狂人日记》不仅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开篇之作，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鲁迅的小说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中国新文学有理由感到骄傲，当它吸纳世界文化新潮，痛切反省自身，走向文学的现代化的时候，因为有了鲁迅，有了

他的《故乡》、《风波》、《祝福》、《肥皂》、《在酒楼上》、《伤逝》等短篇小说，特别是有了《阿Q正传》，中国现代小说一开篇就有了堪与世界优秀文学媲美的成系列的佳作。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的一系列小说，对旧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的现实主义探索的深度，对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俗的革命民主主义批判的深度，均代表了我们民族在“五四”时代的智慧水平，甚至超过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的小说开辟了一个文学的新时代，一个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现代化的新时代。

“五四”是一个摧枯拉朽、狂飙突进的时代。在小说创作方面，首先是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小说创作被赋予了“科学的尊严”，破除了视小说为“名不列于四部，言不齿于缙绅”的卑下艺术的封建陈腐观念，小说恢复了自己的尊严，它从时代思潮中吸取源泉，又反过来推动时代思潮的发展。以小说创作来推动时代的进程，这种时代感和使命感，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优良传统。

现代小说一开始就密切关心现实人生问题，提出文学要“为人生”，既反对忠君载道的封建文学，也反对耽弱趋利的游戏文字。鲁迅的小说一开篇，就站在时代的高度，猛烈向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开火，发出了时代的强音。后继者虽则还没有达到鲁迅那样的思想高度，艺术上一般也显得稚嫩，但是他们能睁开了眼看，发现老大的封建古国身上千疮百孔，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因而发为一篇篇文章，“问题小说”也就因应而生。1919年成立的新潮社以及由该社编辑的《新潮》月刊，就刊登了许多以揭露各种“问题”为使命的短篇小说。叶绍钧、汪敬熙、王统照、孙俍工等写出了一批“问题小说”，而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冰心，更是以创作“问题小说”而闻名，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她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超人》等一系列小说。“问题小说”是“五四”启蒙思潮的产物，作家们严肃地对待生活，在作

品中提出了两代人的冲突问题，家庭婚姻问题，下层社会的苦难问题，妇女教育和人格独立问题，人生的目的问题，等等。但是这些阅世不深、缺乏生活磨炼的青年作家往往只是提出问题，而无力回答这些问题。他们用“爱”与“美”的哲学来弥合社会的不公和人生诸多的缺陷；在艺术表现上，也往往是满足于提出问题，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描述，也显得很不充分，因而“问题小说”作为现代小说起步期的探索文学，它的长处与不足是十分明显的。

“五四”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和思想纷至沓来。“五四”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前驱者，有着容纳世界新潮的胸襟和气魄，有着探索各种题材、体裁、风格的文学作品的胆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五四”时代，是一个青春焕发，创造力和想象力特别丰富的时代，是一个流派纷呈、新人辈出的时代。1921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先后成立，它们分别标举“为人生”和“为艺术”的旗帜，但是从他们各个成员的作品看，都有着鲜明的时代感。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方面的主将是叶绍钧、冰心、王统照、许地山，他们的创作一般均从“问题小说”起步，但很快就超越这个阶段，转变为客观地如实地反映社会现象，对现实作冷静的描写和细密的剖析，努力揭示事物的某些本质方面，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支生力军。而被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它的主要作家的小说创作，兼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特征，郁达夫、郭沫若、倪贻德、陶晶孙等人的作品，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和感伤成份。与文学研究会强调“再现”不同，创造社注重的是“表现”。后起的浅草社、沉钟社、弥洒社，也都程度不同地浸染了这个流派那种感伤、抒情的气氛。郁达夫是这个流派在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家，他的短篇《沉沦》，以大胆的自我暴露，热烈的直抒胸臆、愤怒的诅咒呼喊，震惊了当时的文坛。他所塑造

命的工农形象开始进入小说创作，小说的题材、主题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左倾幼稚病也滋长起来，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五四”文学革命，指责“五四”文学革命是有闲阶级的“一种浅薄的启蒙”，要对之进行“否定之否定”。“五四”新文学那种融汇万物的宏大气魄，变成了一种狭隘的功利观念，浪漫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货色而全盘否定。他们信服“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的法则，对现实主义加以简单庸俗的理解，导致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流行。这样，早期普罗小说中就出现了一种“革命+恋爱”的公式化、模式化的倾向，这在蒋光慈的《野祭》、《菊芬》等一系列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洪灵菲的《流亡》三部曲、华汉的《地泉》三部曲，都可以看到这种描写模式的影子。

1930年3月“左联”的成立，对于克服早期革命文学的左倾幼稚病，团结广大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推展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有着巨大的作用。现代小说创作展开了新生面，迎来了中、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全面丰收。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篇小说不多，长篇更是寥寥无几，而进入第二个十年，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势头大有超过短篇小说之势。叶绍钧的《倪焕之》首先问世，它标志着现代长篇小说在艺术上已逐步成熟，随后我们就看到了一幅现代文学史上长篇巨制大批涌现的场面，茅盾、巴金、老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三位长篇小说家，都在这个时期贡献出了他们的代表作。茅盾的《蚀》三部曲，为我们展示了大革命浪潮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浮沉的面影，而他的《子夜》更是大规模地描绘中国社会，特别是现代都市的巨制。作者用社会科学理论剖析中国社会的性质，用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再现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塑造了吴荪甫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形象；巴金的《家》把视点对准正在走向

没落崩溃的封建大家庭，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凶残腐朽，表现了冲决封建罗网的各色青年的血和泪；老舍则在《骆驼祥子》中通过描述人力车夫祥子从奋斗、挣扎到毁灭的悲剧一生，对旧社会作出了深沉有力的控诉。此外，其他中、长篇佳作还有王统照的《山雨》、李劫人的《死水微澜》、鲁彦的《愤怒的乡村》、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柔石的《二月》等。

短篇小说创作方面也是硕果累累。团结在“左联”旗帜下的一批作家，是30年代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丁玲带着《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闯进文坛，加入“左联”后，写出了《水》等一系列革命意识强烈的作品；被称为“左翼新人”的张天翼，以他的《包氏父子》、《皮带》等作品，对势利庸俗的现实人生进行了犀利而又明快的讽刺，为被革命的浪漫蒂克所困扰的早期左翼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风。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艾芜的《南行记》、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魏金枝、欧阳山、蒋牧良、周文、芦焚等各具特色的创作，丰富了现代小说的画廊。而茅盾的《林家铺子》以及由《春蚕》、《秋收》、《残冬》组成的《农村三部曲》，更是他在科学的世界观指导下，对30年代的农村和市镇进行现实主义的描绘和细密剖析的成果。茅盾的《子夜》以及这些短篇所呈现的总体风格，影响了吴组缃、沙汀、艾芜等人的创作，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说流派——社会剖析派。这些作家不以客观再现现实社会各种人物事件和矛盾斗争为满足，而是在真实描写的同时，进行着科学的理性的解剖和分析。作家总是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采取一种高视角，对描写对象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观察，并力争做到情与理的融合。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揭示的农村破产的悲惨境遇，是多么叫人触目惊心！沙汀的那些描绘川西北乡镇风情的小说，对社会痼疾的批判剖析，又

是多么辛辣有力！

在 30 年代的文坛上，还存在着两个不可忽视的小说流派，这就是以沈从文、废名、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和聚集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周围的，包括刘呐鸥、穆时英、杜衡、叶灵凤等作家的“新感觉派”。这南、北两个作家流派有着迥异的艺术追求。“京派”作家的理论前驱是周作人。他们主张淡化、疏离现实政治意识，揭起人性的宽容的纯文学的旗帜。他们的小说批判现代城市文明，赞美原始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追求总体风格上的平和、淡远和隽永。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以及《萧萧》、《丈夫》、《顾问官》、《贵生》等一系列短篇，废名的短篇集《桃园》、《枣》里面的一些篇什，为中国现代小说史增添了一批精美圆润之作。而“海派”色彩强烈的“新感觉派”，则是在现代都市畸形繁荣的五光十色中，去发掘一种病态的美。它以日本的新感觉派为师，同时又吸收了西方心理分析小说的某些手法，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新感觉小说流派。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施蛰存的《将军底头》、《梅雨之夕》，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体塑像》等都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作。“京派”赞美偏僻闭塞的农村中的淳朴风情和优美人性，而“新感觉派”倾心的却是现代大都会紧张嘈杂、灯红酒绿的商业文明；“京派”以从容舒缓的节奏吟唱着田园牧歌，而“新感觉派”则是以快速跳动的节奏，表现现代都市的生活，它总是刻意捕捉新奇的感觉和印象，大胆地挖掘人物的潜意识和变态心理，使他们的小说在形式、手法、技巧上都有了不少新颖独特的变化。因而“京派”和“新感觉派”小说尽管在 30 年代都不占主流地位，尽管它们在思想上都有某种缺陷，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它们的存在，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园地。

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文学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开始了自己呐喊与沉思、普及与深化的生命历程。炮火激发了广大作家的抗战热情，许多作家奔赴抗日的火线，迅速反映抗日军民的战斗生活，揭露敌人的凶残，鼓舞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因而抗日初期的小说创作，以短小通俗的作品为主，有着较多的浪漫主义成份，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但是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由于环境特殊，作家们无法从容地进行构思，因而往往对素材挖掘不深，流于生活的表面。在这种情况下，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等作品，或是因为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社会中的重大问题，或是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显得更为引人注目。

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国统区的黑暗、腐败，使得人们在抗战初期的那种乐观亢奋情绪冷却了下来。抗战胜利后国统区丑恶的现实，更使作家们感到失望和悲愤。人们重新冷静地审视现实，把满腔的愤怒和悲切化作一篇篇、一部部的揭露批判的华章，这样，我们看到了茅盾的《腐蚀》、巴金的《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沙汀的《还乡记》、艾芜的《山野》、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等一系列长篇佳作。在短篇小说方面，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艾芜的《石青嫂子》以及端木蕻良、骆宾基、碧野、王西彦、田涛、司马文森、于逢、易巩等作家，或是抨击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或是抒发知识分子痛苦的心灵，从北方原野的忧郁，到南国山河的悲壮，都在作家的视野之内。而讽刺锋芒的加强，是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的特

色。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促使作者消褪原先的温情，而增添了讥讽和冷嘲的锋芒。在上海孤岛时期，直至抗战胜利以后，也有一批作家在孜孜屹屹地耕耘着。师陀在那儿创作了短篇集《果园城记》，在凄清、悲凉的情调中，描绘了中原古城的今昔沧桑，唱出了游子对故乡的怀恋深情；钱钟书出版了短篇集《人·兽·鬼》和长篇小说《围城》，作者以舒展自如的才情和出奇的智慧，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张爱玲则以她的短篇集《传奇》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其中《金锁记》一篇，以清新俊逸的笔调，雅致、圆融和意象丰富的语言，描写了麻油店的女儿曹七巧，如何在姜公馆的金钱、地位的搏斗中心理变态和丧失人性，在不得不承受悲剧命运的同时，又为自己的儿女制造着新的悲剧。

而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现代小说创作呈现了另一种面貌。一批与劳动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的新作家出现了，原先在国统区成名的作家，也纷纷进入根据地和解放区，思想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丁玲写出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作品，既有新的思想内容，又保持着作者那种善于对复杂的心理进行细密分析的创作个性。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作家们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对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涌现了赵树理、柳青、孙犁、康濯、秦兆阳、马峰、西戎、刘白羽、马加等一批小说作家。文学创作更加贴紧生活、贴紧群众，更加与时代息息相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孙犁的《荷花淀》系列小说，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等小说，都洋溢着从群众斗争和生活中来的诗情画意，散发着清新诱人的泥土气息和乡野风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高干大》、《种谷记》等长篇小说，则是在更大规模上对解放区农村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进行了描绘，为人

民革命的历史性胜利留下了宝贵的记录。《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虾球传》等长篇，在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章回小说形式来反映人民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可喜的成绩。由于这一时期处于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的炮火中，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作家要紧密地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服务，因而不少作品在充满可贵的政治热情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对生活的丰富性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的描绘；又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相对新文学前两个阶段来说也有所减弱，因而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在强化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的同时，在作品的体裁、语言、结构等表现手法方面，探索性和创造性还不够突出。

从“五四”到四十年代，中国的小说家们在新民主主义时代精神感召下，为推进我国小说艺术走上现代发展的历程立下了不世之功。这个选本只能提供现代短篇小说艺术的吉光片羽，但这些社会生活的折射和个性生命的留痕，斑斑驳驳，读者也不难从中看到时代的面容和艺术的搏动。它们所反映的远不是本世纪前半叶喧哗与躁动的生活的全部，却能让我们涌起历史的恋情，并且放眼于把现代小说的艺术传统承继下来，迎向一个更新的境界和更纯净的碧空，则又是无疑的。

1992年11月 北京

目 录

前言	王保生	(1)
狂人日记	鲁 迅	(1)
潘先生在难中	叶圣陶	(14)
春风沈醉的晚上	郁达夫	(34)
分	冰 心	(50)
春蚕	茅 盾	(62)
断魂枪	老 舍	(87)
丈夫	沈从文	(98)
夜	丁 玲	(120)
华威先生	张天翼	(131)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 汀	(142)
山峡中	艾 芒	(160)
牛车上	萧 红	(180)
菜竹山房	吴组缃	(193)
上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	穆时英	(203)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218)
荷花淀	孙 艋	(235)